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新时期政治理论新探索

王俊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新时期政治理论新探索

王俊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政治理论新探索 / 王俊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3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3-0932-5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16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有一个词叫著书立说，从逻辑上讲不立说而著书就是制造文化垃圾。但是，立说不易，立说是创新，创造前人没有的新见解、观点和思想，这太难了。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而言，一生中要说一句新话，一句属于自己原创的话语几乎不可能，更不要说创造一个得到社会认可而流传下来的概念或词汇，至于说要创造什么思想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对于我国的政治理论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社会任何方面发展的不足，都可以归结为是由创新不足引起的，而创新不足的主要问题可能在于创新资源的短缺，特别是创新人才的缺乏。创新需要自立自主、思想自由和宽松的环境，需要人们对失败、对标新立异、对多元存在的宽容，需要对任何创新主体的呵护；创新也需要机遇，需要创新者有科学的方法，睿智的眼光，打破思维与行为模式上的路径依赖，有时甚至需要创新者付出非常高的代价，等等。创新不易，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创新。

作为一名教师负传道授业解惑之责，自己最多是充当了“知识与思想的贩运者”的角色，所以，一直不敢轻言观点或者理论上的创新。这本小书不是新著，其主要部分是过去发表的论文。内容基本没有做文字上的改动。笔者以为，学术论文特别是政治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有没有价值，有没有生命力，检验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在若干年之后对现实是不是还有解释力，它的观点还能否给今天读者思考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个思想的或逻辑的支点，为他人的学术创造提供参考，或者提供一个小小的论争平台。

本书由四部分构成：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公民政治参与研究和政治观念研究。主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向。

在当代社会，我们在政治上有着太多的诉求：改革、开放、稳定、权

威、秩序、安全、和谐、诚信、文明、民主、民生、自由、平等、法制、法治、人权、宪政、集权、分权、制衡、公平、公正、正义、廉洁、宽容、革命、改良、激进、渐进、独立、爱国、统一、强国、现代、发展等，每一项诉求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都是人们向往的目标。笔者始终以为，在我国，所有这些美好愿景中民主居于首要地位，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只有处于人民当家做主和人民利益的统领之下才具有真理性，才值得追求并具有被普遍认可的价值。

20 世纪的大部分年代，我国基本上是以世界政治的被决定者、被影响者的身份，在革命与改良、激进与渐进、西化与化西，即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艰难选择中前行；21 世纪的中国正在建构自己的发展模式并作为一个主动参与者、自主选择者和积极影响者的世界大国的角色活动在国际舞台上。

20 世纪中国政治围绕的主题曾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等大是大非问题，争论始终停留在了价值层面；21 世纪在上述问题上人们已基本达成共识，国家治理和政治的主题转向了民生，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等关切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问题成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老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政治更接地气，变成了民众可以感知、可以计算的事情。

20 世纪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革命、群众运动、暴风骤雨，是满怀激情地解构秩序与权威；21 世纪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范式正在发生着替代性变化，参与从革命型政治参与向建设型政治参与、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激情型政治参与向理性型政治参与转换，同时，政治制度对公民参与的承载能力更强，也更富有弹性。

与 20 世纪不同，在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世界里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环境更加宽松，人的观念、意识、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文化的宽容、交流、共存、相互吸纳已成常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由价值观念向行为准则转换，逐步成为公民规范自身行为、评价政府、处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基本尺度。

书中的许多问题来源于与学生的交流。感谢我的学生！感谢为论文修改提出意见、建议，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编辑！

目 录

总 论

人民的选择	(3)
中国化：21 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定位	(16)

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

共产党人的首要价值追求及其实现路径分析	(27)
我国执政党利益整合范式价值取向的当代转换分析	(40)
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分析	(49)
全面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论析	(61)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生命线	(67)
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定位	(71)

国家政治制度研究

从强国到民生：新世纪我国政治发展主题的确立及其意义	(81)
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权威性建构的基本特色	(91)
当代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未来走向	(106)
我国国家权力结构研究中的误区	(117)
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共和制实践的基本特色	(124)
议行合一与我国的人大制度	(138)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多数暴政”问题分析	(144)

民主政治中的多数与少数关系模式简析	(159)
对“依法治省”提法的几点看法	(168)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简析	(173)

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范式转换的新取向	(181)
政治制度创新视角中的农民创举	(190)
高校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	(199)

政治观念研究

古代中国的整体国家观及其价值分析	(211)
古代中国民族观与国家统一	(223)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	(234)
略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定位的基本逻辑	(244)
略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张力及其启示	(254)
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的逻辑	(263)

总 论

人民的选择

世界上本来没有政治，有了人就有了需要管理的公共事务，于是政治便逐步地产生了出来。政治是人造物，人造的事物有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这是长久以来不断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国政治发展有没有规律性的问题也来源于此，同时，政治发展规律问题的探讨也基于人们对中国政治认识与实践的现实需要。

要探究政治发展的规律性问题，需要从政治学学科的科学性说起。

政治学有没有科学性？社会上没有多少人知道政治学还是一个学科，是一门学问，更没有多少人认为政治学是科学，就是这个学科的学生对此也充满疑惑。政治学不是面向大众的，要普通民众谈自己对政治学的认知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我国政治还没有为自己争得一个好名声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但是，作为教学活动的学术探讨，论证政治学的科学性则是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对一定条件下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正确揭示与总结的系统认识，是运用定律、定理、范畴等思维方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依据这样的解释，政治学作为科学，它就是对政治生活发展变化规律的揭示与总结，是以基本范畴、观点、思想等思维和思辨形式反映的政治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

政治学是揭示政治发展规律的，那么，政治发展有没有规律？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性无可争辩，因为它是客观的，具有可把握性、可验证性、可预测性，而说政治发展有规律就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因为政治是人造的东西，是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人造属性意味着政治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常说在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还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人为设计的

结果。选择和设计表明政治是人基于自身的利益追求、价值观念和特定的文化取向而建构出来的。那么，人造物的发展有规律吗？

如果不从价值层面审视而仅仅从经验层面观察，可以看出，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比如，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普遍的政治博弈，实际上就是一个争取支持者的过程。一般来说，当博弈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那它就会在博弈中胜出，这应该是个政治规律。小到个人对政治职位的竞取，大到政党对国家政权的取得，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特定地位的获得，都是如此。作为一个人来说，要使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就必须使利益相关人中的多数对自己有所认同，乃至支持，不然就会成为孤家寡人而使自己的处境困难重重。对一个政党来说，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诉求，不论是取得政权还是实现本党设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没有多数民众的支持都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竞取国家政权无论是采取暴力手段还是票决方式，实际上都是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当年争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实际上就是与国民党争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当共产党争得了多数民众拥护时，国民党政权也就不可避免地终结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论大小，如果在国际社会没有多数国家的认可、同情和支持，它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就没有可能。可以说，在多数以“力”而非以“理”论成败的政治场合，这一规律都是存在的。

政治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政治发展规律的存在肯定不是单数，应该是复数。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政治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他认为人类社会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几个发展阶段，这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但是，要让人接受和信奉这一学说，心服口服地承认这一规律，是一件不易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大规律，大在哪里？大在了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使我们任何一个人作为个体无法经验这个规律，以自身的实践无法体验这个规律，因而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它的认知。这可能是作为个体的人对社会发展政治规律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个障碍吧。

作为个体的人不可能经验漫长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律，那么，能不能经验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发展规律，比如说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律呢？应该说是肯定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使个

体的人的经验成为不可能，但对于20世纪的100年来说，个体的人的经验显然是可能的。那么，20世纪的100年中国政治的发展有没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呢？肯定有，是什么呢？这完全是一个基于逻辑推理而提出的问题。这不是笔者一定就能做出回答的问题，更谈不上做出满意的回答。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0世纪100年的中国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较量的年代，也是世界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政治风云激荡，社会跳跃式发展，天翻地覆是这一时代的主色调。俯瞰百年中国这一政治舞台，我们就会发现，百年中国社会呈现出了一种波浪式的发展态势，这就是每过十年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发展的不稳态现象，而且这种不稳态大都集中在每个年代的七、八、九三年，这几乎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常态”。

1917—1919年，1917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并由此直接导致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并促使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转折点。

1927—1929年，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国民党统一了中国，成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国共合作的破裂、南昌起义爆发。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师井冈山，创建了革命军队，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中国两大政党就国家政权的归属问题展开的殊死搏斗正式开始，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1937—1939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此后，上海、太原失守。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徐州、武汉相继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全面侵略，中华民族处于危机之中。

1947—1949年，著名的三大战役，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国家政权的转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是，政治发展的不稳态并没有结束。从1957年起，以维护国家政权为指向的政治斗争和以推动社会发展为出发点的政治运动却此起彼伏，呈现出周期性。

1957—1959年，“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接踵而来的是1958年5月在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一直持续到1959年夏。

1966—1969年,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1968年9月,自上而下的革命委员会夺取了各级党委、政府权力并取而代之。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走向了高潮。“文化大革命”历经10年,使党、国家、人民和中国社会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6—1978年,开国领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强调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87—1989年,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等规定载入宪法。这是宪法对经济制度规定的突破性变革。

1997—1999年,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6月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世纪末的七、八、九三年,政治是和平的、有序的,不再以曲折的形式、以体制外手段寻求发展,历史以凯歌行进的方式进入新世纪,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政治景观,这是在经济社会转型基础上中国政治转型的开始,是政治出现新趋向的标志。

百年历史的这种回顾和概括太简单了,只涉及每个年代七、八、九三

年的重大事件而舍弃了其他，这有基于说明自己观点的需要而剪裁历史之嫌，也有着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否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一个可以由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可以肯定，这一历史描述的框架不一定为所有人认可。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这一历史描述框架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将百年中国宏大、复杂、曲折、沉重的政治故事粗线条地展现了出来，而且使它的特性更加凸显，使政治发展样态的展现更为集中。

每个年代七、八、九三年的政治发展不稳态，都给中国政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影响了政治的发展进程。从类型学意义上说，有些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如1917—1919年、1947—194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些则是灾难性的，如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大大延滞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战略选择等则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用不稳态概括不同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明，不稳态是一个表明社会发展出现了突然的、短时间的、较大变化现象的中性词，而在价值取向上没有给它赋予正向性或负向性的意蕴。

集中表现在每个年代七、八、九三年的政治发展不稳态，是百年中国政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人为的社会现象，还是注定了的、不可改变的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这种设问的思维模式是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它可能使我们的分析掉进自己为自己事先挖好了的坑里去而影响对问题本身的分析。从逻辑上讲，如果说它是规律，那就是说当政治这一人造物被创造出来之后它就具有了自组织性，就会脱离创造者而依据自身的规律运行，成为人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实在”，并以人为约束对象，改造人、塑造人。这就是说，政治规律是一种异化现象，人的创造物成了人的主宰者，我们不能改变它，不能废除它，只有顺从它。从现实政治来看，如果它是规律，21世纪的中国政治就会重复20世纪每过10年就在七、八、九三年出现不稳态的周期性状态而不能自拔。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不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了吗？我们就不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而永无出头之日吗？我们改变自身和社会的实践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它不是规律，为什么却会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

当然，社会不稳态所呈现的周期性，不同于基于因果关系的自然界的周期性。严格地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并无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可检验、可重复

出现的那种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周期性。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其所依赖的社会条件都是一次性出现的,后来事件的产生,即便是它们的发生条件具有相似性,但也没有严格的一致性,至多是部分的相似而已。我们所说的周期性不稳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是对已有的历史经验的概括。因此,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呈现出来的规律只能是“类规律”。如果说自然规律是作为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在起作用,那么,社会规律这种相对于客观的自然规律的类规律就是由价值多元的、目的和意图多样化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共同作用、共同创造的。

依据“人创造历史”的逻辑,历史就是人类自身选择的结果。人创造了它,人也就可以改变它。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历史就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和改变自己创造的物的过程。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人类最终不会成为人造物的奴隶。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①。恩格斯的观点告诉我们,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又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创造的。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历史是自身之外的“客观世界”,个体的人不能依据自己的意图而改变它。因为对每一位个体的人来说,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更是这样。当历史进程在某种社会力量主导下朝着某一方向演进时,个人会感觉到历史是被一支无形的强大力量推动着并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客观现象,任何个体的人在它面前都无能为力,根本不能影响更谈不上改变这样一个进程。正是在无法左右历史的个体的共同作用之下,才使历史成为它能够成为的那样,即产生出与每个人最初期望都不相一致的结果。于是个体的人便会产生历史由某种客观规律推动的意识,感觉到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在。当然，并不是每一具体的个人在历史面前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对于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如政治家来说，他们是未来社会蓝图的设计者、宣传者，也是将其付诸于实施的组织者、领导者，如果他们对社会建构的理想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并将这种实现构想的社会企盼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成功地实现自己预定的政治目标，这种成功就特别容易给他们以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自信，并且使他们将自己的意图、理念和设计提升到历史规律的层面上去。历史发展的过程使他们易于产生自己的认识就是对社会规律性的认知，甚至将它与自然界的规律等量齐观，把人造类规律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看成是一回事。但是，对于由单个人组成的人类群体来说，历史就不是自身之外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人类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历史及其发展是由他们决定的，正是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信念甚至人性本能的驱使使人所做出的选择才创造了历史。因此，它不可能有自然界那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创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类规律也不是任何一个作为个体的人能够改变的，而能够改变它的只能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出的合力。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类规律与客观的自然规律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百年中国政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周期性的政治发展不稳态是各种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是一种作为任何个体的人都不能改变的类规律，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却能够改变它，能够重新塑造21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态势，而这种改变和重塑的前提在于认识它、掌握它。

怎样看待每个年代七、八、九三年的政治发展不稳态，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把百年中国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还是看成截然不同的两个50年，就令人非常纠结。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政治上的不妥当之处在于，前50年与后5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执政的政治主体、国家与社会的性质不能同日而语，如果等量齐观，会遇到政治上的评判困境，就是说方法论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与冲突会使学术研究成为不可能。而如果不把前50年与后5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则不能说明为什么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周期性现象却仍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一问题。

从时代条件来看，刚刚过去的20世纪离我们太近，犹如一棵参天大

树覆盖它周围的土地一样，20 世纪历史的投影也深深地影响和决定着当代中国社会，作为利益相关者要客观、公正地评价那个时代的大是大非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社会发展却需要对过去进行评价，需要为认识今天提供指向。

历史是由作为整体的、自觉与不自觉、自主与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各种力量，即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出的合力塑造的，正是这种任何个体不能改变的合力所具有的特性转换成了 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周期性不稳态现象，这种不稳态的特点在于，一是突变性。所谓突变性就是政治力量对比，或者是社会发展面临问题，或者是社会性质、意识形态、社会发展方式等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发展方向的突然转折。突变性常常使得社会发展出现突然断裂，使人的心理、观念和行为在新与旧、过去与现在的选择中陷入两难而无所适从。同时，它又给百年以来寻求变革的中国人以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寄希望于通过突变跨越卡夫丁峡谷，以突变来摆脱落后、贫穷和受人欺凌的状态。人们坚信，突变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不会是新的锁链，得到的只能是一个新世界，这一必然性的发展逻辑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塑造着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从期望突变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和理想的社会变革模式的意义上讲，20 世纪周期性的政治不稳态则是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实践形态。二是跳跃性。基于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经久不变的痛苦经验，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革命乃至战争式的跳跃式发展是 20 世纪中国人崇尚的社会变革方式，人们相信跳跃无疑会大大加快社会发展速度，缩短社会发展过程，超越其他国家不得不经历的痛苦的发展阶段，尽快实现自身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跳跃式发展也使得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旧事物不能有效转换的空白期，在政治上出现专制制度被废黜而自由却未产生、君主制被废除而民主制度难以建立、人治受到鞭挞而法治状态却遥遥无期的现象。导致人的行为失范、社会失准、发展失序，付出比常态发展高得多的成本与代价。三是不可预测性。在自然界，可预测性是指自然现象建立在客观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它是可以把握、验证和可重复的。与自然界不同，在社会生活领域，可预测性则有赖于社会生活严格按照人造制度的规定有序运行。制度是行为准则、评价尺度和规定社会未来发展走向的强制性规范，有了人人严格、自觉地遵守的制度，人就可以预测行为的后果并把握自己的未来，即掌握自己的命运，当